

財政社會學觀點下之國家財政赤字

張嘉仁*

【摘要】

我國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若依債務的統計數字來看，不論就每年收支餘絀與各級政府所累積的債務未償餘額而言，目前皆有嚴重的擴大趨勢。而目前政府對此財政赤字所採取的策略，包括：開源節流、民營化、鬆綁化、限制公債之舉借與債務上限、總體預算制度、企業化預算制度等等。然而，儘管有這些努力，財政赤字卻看不出有任何減輕的跡象，仍然無法有效的掌控且不斷的擴張。

對此，本文介紹強調「整體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的社會，而財政只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之財政社會學，探討財政社會學對財政赤字問題的觀點。藉此，一方面，可以了解為何我國的財政赤字無法有效的掌控且不斷的擴張；另一方面，可以作為我國政府，為了因應財政赤字問題，所應採取策略之理論基礎。

而經由了解財政社會學對財政赤字問題的觀點後，面對後工業社會下，台灣的財政赤字問題，就可以藉由探討台灣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來了解財政赤字形成的根本，而對於後工業社會下，台灣之社會內部組成結構有系統的加以分析，則能掌握財政赤字的癥結。

關鍵詞：財政赤字、財政社會學、引申二元論

*中原大學會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博士，E-mail：ccj@cycu.edu.tw



壹、前言

就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而言，若依債務的統計數字來看，各級政府的收支餘絀每年皆達數千億¹，使得各級政府所累積的債務未償餘額，在九十八年底時已經高達4兆7,486億元，所占前三年度GNP平均數的比率高達36.7%²。其中，中央政府為31.9%；地方政府為4.8%。因此，不論就流量(每年收支餘絀)與存量(各級政府所累積的債務未償餘額)來看，皆有嚴重的擴大趨勢。

面對上述的財政困難，不僅僅是政府的執行能力受到減弱，更影響到各個不同的施政領域，包括國防外交、經濟發展、社會安全、教育科學文化、環境與自然資源等不同的層面。因此，如何紓解財政困境自然成為當前重大之議題。而在面對財政赤字的問題上，主要有下列三種不同的理論基礎³。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種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其就財政收支結構的本身，來看待財政赤字問題，認為財政赤字的成因，就在於財政收入小於財政支出。因為其將國家或政府的經濟活動，視同於市場經濟之交易活動，所以政府只是市場經濟中的營利事業，與一般的民間企業相同，其理財的原則皆為「量入為出」，因此政府若發生財政赤字的問題，就如同民間企業發生虧損一般，需要去除之、限制之。換言之，這是一種純經濟面的分析。

第二種是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其在方法論上是根源於新古典經濟理論，然而與上述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大的差別，在於這時政府決策是模型中的內生變數，而不再是外生變數，而這個政府決策是一個參與決策人員彼此互動的體系。因此，其認為財政赤字就是一種政府失靈的狀況，而財政赤字的成因在於，平衡預算原則為赤字預算政策所取代、財政幻覺、競租行為等因素。因此，主張應由財政制

¹ 98年財政統計年報表1-1。

² 98年財政統計年報表7。

³ 這三種不同的觀點，或更確切的說：「典範」。典範(paradigm)的概念由T. S. Kuhn(1962)所提出，所謂典範是指，廣泛被研究社群所接受的科學研究範例，包含定律、理論、假設前提、應用及儀器的設計、製作、操作等要素。而學者加入研究社群的研究，通常都由典範入手。該科學社群其他成員都是經由相同的模式習得該門科學的基礎，加入後的研究活動，很少會引起公開的對於本行基本前提的異議。研究者以共同的典範為基礎，就能信守相同的研究規則及標準(程樹德等，2005：246)。



度及民主政治的預算決策過程，來看財政赤字問題。換言之，這是一種純政治面的分析。

第三種則是財政社會學(fiscal sociology)的觀點：其強調由國家財政預算，來看整個國家所潛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將國家的財政收支變化，作為了解國家角色與功能轉變的一種方法。就如同提出財政社會學研究取向的 Rudolf Goldscheid 所言，其認為應將財政程序置於國家活動的中心，並藉由探討多數家計單位的社會狀況與財政狀況，以及其加諸於社會的影響，來解釋財政赤字(Goldscheid, 1967)。在這樣的認知之下，則認為財政赤字只是一種症狀，其背後所表示的，乃是社會上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因此，對於財政赤字的問題，該重視的乃是，在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下，社會階層之間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衝突，而衍生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也就是說，由國家的財政預算可以看出國家所潛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而若想要了解財政赤字的根源，則必須從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來探討(黃世鑫，1994)。

現行我國政府面對財政赤字的問題，乃是基於新古典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所以其所採行之策略集中在政府預算的層面。包括：開源節流、民營化、鬆綁化、限制公債之舉借與債務上限、總體預算制度、企業化預算制度等等。然而這樣的策略，由於未能與更為廣泛的經濟問題，和社會、政治體系的問題聯繫起來，沒有辦法能與社會上眾多群體的互動聯繫起來，因此只是一種治標的方法⁴。

因此，財政社會學對於財政赤字的觀點，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一方面可以了解現行政府因應財政赤字的策略為何沒有效果；另一方面，可以作為現行

⁴在目前的經濟社會環境下，新古典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典範並不適合用來分析我國目前的財政赤字問題。一方面，我國在民國七十六年解除戒嚴之後，已經逐漸邁入民主社會，不再是獨裁政權。在民主社會當中，政府需要根據民眾的需求來反應政府支出，而且需要對民眾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而非可憑獨裁者的經濟理性來完全自主的決定。另一方面，我國於民國七十七、七十八年之後已經逐漸邁入後工業社會(林萬億，2008、李碧涵，1994)。在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下，政府的預算決策需要考慮整體社會變遷所反映出來的社會需求，而不僅僅是利益團體或是官僚的需求。而且因應財政赤字的策略需要與更為廣泛的經濟問題和社會、政治體系的問題聯繫起來，更需考慮社會上眾多群體的互動聯繫。



政府因應財政赤字之策略的理論基礎⁵。

貳、財政社會學之方法論

財政社會學的發展可分為兩個主要的傳統：一個是在奧地利(Austria)；另一個是義大利(Italy)。在奧地利傳統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是 Goldscheid 與 Joseph A. Schumpeter⁶，而義大利傳統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是 Vilfredo Pareto、Gino Borgatta 與 Guido Sensini⁷。

其在方法論的特性上，奧地利傳統，主要是基於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而義大利傳統，主要是基於多元論與引申二元論。

一、辯證的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奧地利傳統對於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基於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

(一) 辯證法

辯證法(dialectic。德語 dialektik)原本是意味對話或辯論的方法。一般是意味並非片面或偏頗的，而為多方面、整體性的見解，指對立事物的統一而言。此項見解的成立，是根據所謂現實、具體存在的事物，皆不受制於片面規範的一種認識。即使是一個事物，有時亦帶有對立的規範，而複數的事物亦有對立的情形。此時，「對立事物統一」的辯證法便告成立。進而在時間、空間上加以統一時，則形成極為綜合性、整體性的見解⁸。

⁵ 而以財政社會學之研究典範，來對於我國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變遷的研究，則將另文再加以探討。

⁶ 美國對於此傳統的後續研究上，主要的代表人物是 James O'Connor 與 Richard A. Musgrave。

⁷ 義大利的財政社會學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都是 Pareto 的學生。

⁸ 參考維基百科全書。



(二) 生產模式

生產模式是由兩種現象構成的。首先是生產力(the force of production)，意指生產效率，包括人的工作能力、使用工具的能力以及生產工具。詳細而言，生產力就是生產過程中，那些基本的和本質的要素，它是分析表明為構成直接生產過程本身的因素。由於任何的勞動過程都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因此這些要素即是生產力的概念。其中，生產資料包括生產工具和原料，勞動力則包括生產者的體力、技術等因素。這當中的每一項都是生產者用來製造產品的，生產工具指的是他們用什麼來工作，原料指的是他們勞動作用的對象，勞動力指的是他們使用什麼生產工具能作用於原料。而生產力的水平，將決定生產關係的基本結構，也就是社會生活的基礎。

其次是生產關係，包括勞動關係與所有權關係。生產過程必然包括，處於某一相互關係中的人和生產資料。要生產有一定的使用價值，生產必定要處於某種確定的關係網絡中。生產在其中進行的實際關係，在這裡成為生產的勞動關係，亦即，支配實際勞動過程中，從其特殊的社會和歷史形式中，抽象出來的物質與技術關係。另外，則是所有權關係。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會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会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才会有生產。這種關係，包括人們用來調整彼此之間，對待生產力或生產結果的產品關係，這些關係都與財產或所有權有關，所以稱為所有權關係(楊世雄，2001：23；鄭劍豪，2002：19-25)。

生產關係在確定一整套的現象，也就是上層建築。這包括：一切政治制度；一切有組織的宗教、政治社團、法律、風俗，還有人的意識。而生產關係所帶來一定種類の上層建築，是由彼此對抗的各個方面構成，因為以獲取別人勞動成果為本的生產關係，把社會劃分成利害對立的階級，階級鬥爭在上層建築方面表現為政治勢力和輿論的衝突。上層建築就是為了在剩餘勞動產品中，獲取最大份額，而彼此鬥爭的各階級所使用的武器總和(馬元德、張金言，1992：385-386)。

(三) 辯證唯物主義

透過利用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馬克思試圖表現出觀念是次於物質的生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AF%E8%AD%89%E6%B3%95&variant=zh-tw>



產，所以在每個生產模式中，命題(非生產者階級)被他的反命題(生產者階級)，以一個最終的合(推翻原先生產模式的革命)所否定，並導致一個新的且更為成熟的生產模式。而在任何一種生產模式中，後者透過剝削來榨取前者的剩餘價值。這種矛盾關係是對立的，以至於宰制階級，以犧牲下層階級來獲取經濟利益的情況下，這兩個階級會進行一個零和的權力鬥爭(Hobson, 2000: 111)。

也就是說，辯證唯物主義是運用生產、交易和分配的過程中，所存在著矛盾，用以解釋歷史變遷；此種矛盾的漸次加深，導向危機，最終引發革命，而產生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新經濟制度(黃世鑫，2003: 95)。

根據這種綜合性、整體性的觀念可知，辯證唯物主義是透過物質生產模式的結構與變遷，來解釋社會的結構與變遷，這就是所謂的「下層基礎—上層結構」的模式，生產模式所決定的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經濟的結構，即是下層基礎。上層結構(包括政治、文化與意識型態)係相對應於一特定形式的社會意識，而這又根源於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因此，經濟基礎的改變會導致上層結構的轉型。

二、多元論(pluralism)與引申二元論(derived dualism)

義大利傳統對於財政赤字問題的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基於多元論與引申二元論。茲分下列三方面來說明：

(一) 笛卡兒系統⁹與非笛卡兒系統¹⁰的互為補充

⁹ 這邊是指笛卡兒式的二元論(Cartesian dualism)，這主要源自於 René Descartes 的心物二元論，主張身體(或物質)與心靈在某個層面，是完全不同而且彼此無法化約或取代的東西。二元論的主張就是認為有兩種根本上完全不同，而且無法統合的東西的存在(冀劍制，2006: 1)。依照 Sheila C. Dow 的定義，二元論須滿足三個條件，首先是分類為完整的、全部包含的(all-encompassing)，其次是互相專有的(mutually exclusive)，最後是固定的意義(defined with fixed meaning) (Dow, 1990)。二元論這種笛卡兒的思想模式，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中達到一個最一致的表現，而且亦隱含在其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當中。以一般均衡理論而言，其乃是基於個人的理論要素而建構的，例如：個人、財貨、要素、順序偏好，這些可以適當的被分類為完整的、全部包含的、互相專有的、固定的意義。且一般均衡的理論結果亦是二元論的，經濟的狀態在商品空間上，典型的呈現為「一個均衡點」或「不是一個均衡點」(McLure, 2004)。

¹⁰ 這邊是指非笛卡兒式的二元論(non-Cartesian dualism)，Pareto 的財政社會學中，引申二元



我們可以藉由 Pareto 對於財政社會學的看法，來了解其背後的方法論基礎。Pareto 的財政社會學可以用下列五種主要的特性來說明(McLure, 2004)：

1. 財政現象的基本面向：由於租稅、支出、公債所產生之經濟財貨的淨分配。
2. 財政現象的意涵：財政重分配的意涵，必須建立在關注經濟均衡與社會均衡上。
3. 經濟均衡的研究：經濟理論應用至財政現象，提供財政活動對經濟均衡之影響的某些觀點；然而，這只是部分的，因為經濟均衡與社會均衡之間有相互依賴性。因此為了要評價財政重分配，與經濟均衡之間的關係，經濟與社會的分析都是需要的。
4. 社會均衡的研究：考慮財政重分配之社會狀態移動的穩定性與不穩定性，特別是針對管理精英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還有投機者(speculators)¹¹ 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rentiers)¹²之間。
5. 方法論的方法：邏輯行動與非邏輯行動，在實驗方法與本體論上之區別。

上述特性 3，是笛卡兒分析方法的特色，給傳統的財政經濟學一個空間。笛卡兒的分析方法，是主流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有四項主要的要素：原子論本體論的假設、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特殊形式、達到無意識地或科學地創造封閉系統可能性的信念，以及機械性的方法，在其中的經濟行動者被假設為一致性、公式性、事先規劃性的行動，與牛頓的物理學一致。

基於笛卡兒模式的形式分析，於原子論的發展而達到高峰，構成模型的每一個要素依二元論而分類：一項要素是 1¹³ 或者是 0¹⁴。Dow 認為對於真實性本體論的觀點，基於原子論與二元論分類會決定認識論、方法論，並且最終決定高度形式化的分析與決定性理論。

特性 4，則限制了笛卡兒分析方法的使用範圍，因為社會均衡的分析是建立

論的運用，其對於二元論的使用，是沒有全部包含(not all-encompassing)而且沒有互相專有(not mutually exclusive)。

¹¹ 高風險。

¹² 低風險。

¹³ category X。

¹⁴ not category X。



在非笛卡兒的基礎上。也就是說，一旦一個財政事件，已經在社會中重分配經濟貨物，則財政事件與社會均衡之間的關係，並不定義均衡在貨物空間(commodity space)上。社會均衡定義為，社會狀態的穩定與不穩定，與在一個特殊的社會狀態中，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利之間的平衡。這個特性亦指出其他潛在的二元論，例如：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區別，投機者¹⁵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¹⁶之間的區別。

由上述這兩個特性可知，Pareto 的財政社會學採用兩種想法的系統互為補充，其一為非笛卡兒系統，另一為笛卡兒系統。而 Pareto 發展的方法論是為了避免在社會理論中錯誤的決定論。

(二) 引申二元論的角色

當然 Pareto 財政社會學所採用的二元論，並非純粹二元論(pure dualism)，因為基於笛卡兒系統的分析不會是絕對的，總是會受限於來自社會影響的干擾(使用非笛卡兒的系統來檢視)。Pareto 所使用的二元論是引申二元論¹⁷，也就是說，Pareto 對於二元論的使用是沒有全部包含而且沒有互相專有。不像純粹二元論的邏輯(logical)與不合邏輯(illogical)，或理性(rational)與不合理性(irrational)，Pareto 的邏輯與非邏輯(non-logical)行動是引申二元論，其邏輯與非邏輯之間是互相形構的。

當一個行動者的主觀意圖，與客觀目的是相同的或完全一致的，則該行動稱為邏輯。而當一個行動者的主觀意圖，與客觀目的是相互依賴的，則該行動稱為非邏輯。重要的是，非邏輯行動並不是不合邏輯，他只是邏輯與情感意向有所互動。非邏輯行動可以視為虛擬邏輯(pseudo-logical)行動，類似於邏輯行動。因此，Pareto 實際上認為人類的行為呈現邏輯與非邏輯要素的整合。也就是說，有一個

¹⁵ 高風險。

¹⁶ 低風險。

¹⁷ 兩極(bi-poles)視為是相對的，極的相對可以視為一個連續。例如，財政系統可以顯示不同程度的財政分權，從極端極權到極端分權。極可以轉換成二元論，藉由一條責任線(fault line)區分成兩邊，例如：財政系統可以分成極權與分權。引申二元論很少是互相專有的，通常是互相形構的(mutually constitutive)。例如上述財政分權的例子，沒有財政系統是完全的極權或完全的分權。人類天生的情感會協調社會與個人的行為，其確保持續的財政系統是極權與分權的混合。因此，中央集權的財政系統，必然包含某些分權財政系統的特性。



連續區間，從嚴格的邏輯行動至非邏輯行動，基於不同程度的互動(在選擇時邏輯與情感意向的互動)，而有不同程度的組合。

也因藉著使用引申二元論來區分行動的型態，Pareto 在社會科學上給予多元論¹⁸設定了一個方法論的基礎。邏輯行動的理論基於笛卡兒的基礎，而非邏輯行動的理論基於非笛卡兒的基礎。

Pareto 認為非邏輯的行動，若使用笛卡兒的方式去分析的話，會產生錯誤的決定論。Pareto 分析方法的一項有趣特性是，非笛卡兒方法本身是由一個引申二元論的系統所創造。也因此，二元論對於 Pareto 發展非笛卡兒分析方式的社會理論有重大貢獻。例如：ophelimity(從嗜好滿足得到快樂的一個外生指標)與效用 utility(物理、社會、情緒之幸福的指標，內生量化的)之間，引申二元論的區別，對於區分連結經濟的與社會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基礎。

Ophelimity 是 Pareto 用來方便做笛卡兒分析方式的一項觀念，因為它是外生的，且藉此能使動態的現象化約為靜態模型。效用是一項分析觀念，方便於動態現象的非笛卡兒分析方式，而不會有錯誤的決定論。而基於效用的分析，是非笛卡兒分析方式所必須的，因為 Pareto 認為隨著社會狀態的變化，意義與衡量會改變。非邏輯行動，若用笛卡兒的分析方式將是錯誤的決定論，因為客觀的目的，與主觀的目的並不完全一致，而且個人的效用函數隨著時間的經過而改變(由於主觀目的與客觀目的的互動)¹⁹。

(三) 純粹財政學的角色

Pareto 之財政社會學，雖然發展非笛卡兒模式的分析方法，但並未完全拒絕純粹財政學(pure public finance)。例如：Borgatta 考慮經濟狀況在兩個狀態之間的移動與財政事件的關連，他用兩種相互補充的方法來分析：1.使用比較經濟靜態，去考慮特殊財政事件的經濟效果，這是在假設社會均衡及個人的 ophelimity 不變之下。2.使用比較社會靜態，去考慮是否財政事件已改變社會狀態(例如：如果社會均衡的穩定性已改變，將如何改變效用)。

上述，第 1 個方法(笛卡兒模式)是基於財政經濟學(邏輯的行為基於 ophelimity

¹⁸ 多元論認為世界由不同元素所組成。

¹⁹ 另外的例子還有「個人與集體」、「投機者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等等。



外生給定在最初的社會均衡下)。第 2 個方法(非笛卡兒模式)是想要去決定,是否歸因於財政事件的經濟財貨重分配,已改變個人或政府菁英對於效用的評估(也就是說,在財政活動的領域中,是否非邏輯的行為會導致內生的變動)。

參、財政社會學對於財政問題的研究方法

奧地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與義大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其對於財政問題的研究上,皆是想藉由對於財政問題的分析,來了解整個國家經濟社會體系裡,所潛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亦即,藉由探討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的狀況,來看出整個國家所潛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因此財政社會學所謂的財政赤字問題,乃是指財政赤字背後所顯現的整個國家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這與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財政赤字本身是一個問題,乃是理論上的根本差異。

而且在分析的方法上,基本上都認為整體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的社會,而財政只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而且都運用階級(團體)分析來探討財政問題,茲分別從這兩個方面說明如下:

一、強調整體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的社會,而財政只是整體社會的一部份

基本上,認為整體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的社會,強調構成社會整體的各部份之間的結構性關聯,財政只是整體社會的一部份。茲再細分八項闡明如下:

(一) 財政程序為國家活動的中心

Goldscheid 將財政程序置於國家活動的中心,藉由探討多數家計單位的社會狀況與財政狀況,以及其加諸於社會的影響,來解釋財政赤字(Goldscheid, 1967)。也就是說國家預算的內容,可以呈現出整體經濟社會體系當中,關於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從國家預算的內容當中,更可以看出當時社會所潛在的各項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而不同團體(階級)對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力,決定了資源的分配與財政收支的結果。



(二) 財政事件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Schumpeter 認為對於隱藏在預算數字背後的財政事件，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以及其之間所引起之相互變動的歷史事實，必須加以討論，才能夠對於世事之演變有所體會。財政社會學是一門研究國家財政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各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國家之性質的一門學問。想要了解一個國家的財政政策，最好從他的預算來切入，因為，預算是一個國家賴以建立的骨骼，其中所表露的都是一些確切的事實，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宣揚。這種一年一度預算的變化就成為一個國家的財政史。這種財政史也就成為一個國家所有歷史中的最重要部分，其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其影響是相當大的。

在有些時期，財政政策的變化，幾乎可以用來解釋一個國家，所發生之重大事件的全部；在大多數時期，也可以用來說明其所發生之重大事件的一大部分。不但是這樣，甚至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文化水準、社會結構等等都可以在財政史當中，找到一些痕跡。

財政事件所發揮的重大影響，可以在一個國家面臨重大改變的時期看出來。在這種時期，舊的體制已經開始崩潰，而新的結構又即將隨之而出現，這在財政上就會發生危機。這樣，我們可能就必然會面對一連串特殊的事實，一系列特殊的問題，以及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簡單來說，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這就是財政社會學。在這些研究方法中，有一個特別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就是從財政方面來觀察國家，觀察他的性質，他的型態以及他的將來(Schumpeter, 1954)。

(三) 財政現象的評估需連結經濟均衡與社會均衡

Pareto 認為經濟、社會變動所導致經濟及社會均衡的改變，會影響稅收、支出及公債的組合(McClure, 2005)。Pareto 認為財政現象的評估需連結經濟均衡與社會均衡，經濟均衡是純粹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現象，社會均衡的研究是屬於應用經濟學，應用描述、實證與綜合的混合方法來研究。社會均衡為理論社會學的主要研究現象。而財政現象是財政事件、經濟均衡、社會均衡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

因此，Pareto 認為對於財政現象的理論處理，需要的不僅僅是經濟面與政治面。因為財政事件的經濟與政治層面與廣泛的社會限制互動，這種互動改變個人



的效用評估。所以財政活動最好由他與社會因素的關係來評價²⁰。在財政工具的效果被觀察到前，有必要去檢視財政決策與社會均衡(包括構成社會均衡之經濟、政治、行為的平衡)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Mclure, 2003)。

(四) 由政治結構實現財政系統

Borgatta 認為實際的經濟因素，決定社會與政治的結構，且藉由政治結構實現財政系統。Borgatta 區分社會現象為：經濟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且他以主觀的目的、客觀的結果、主觀的原因、客觀的原因，來研究這些種類。Borgatta 藉由介紹三種虛擬經濟的形式來說明，非邏輯的行動如何擴展至經濟活動。行動可以區分為— α ：當主觀的經濟意圖，與意圖或實際的客觀經濟目的不同時。 β ：當客觀的經濟目的，與主觀的意圖不同，是因為行動者，對於他經濟目的的行動沒有正確的觀念。 γ ：當意圖的客觀經濟目的，與意圖的主觀目的相同，但實際的經濟結果與意圖的客觀目的不同。Borgatta 認為財政現象是屬於 γ 形式的活動(Mclure, 2006)。

Borgatta 認為財政事件會影響經濟活動，但財政事件亦可能影響社會效用，當社會均衡有變化時，社會效用會有內生變動的可能性。在這樣的考慮下，社會均衡的實質移動預期會持續很久。而社會均衡亦有短期變化的可能性(社會或經濟循環的階段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Borgatta 對於財政事件與相關聯的經濟均衡移動上，他用兩個互為補充的方法來處理。首先，先假設社會均衡及社會效用保持不變(不受財政事件影響)，再使用比較經濟靜態，去考慮特殊財政事件的經濟效果。其次，使用比較社會靜態，去考慮是否財政事件有改變社會均衡及社會效用。這個步驟是想要知道財政事件，對於經濟範圍外的重分配，是否已經改變個人或政府對於社會效用的評估。

這樣的方法是對於 Pareto 處理效用方法的一種應用。其中，在邏輯行動的分析部分，經濟現象是在假設 ophelimity 外生給定下來考慮的，而非邏輯行動的分析部分，是在假設 utility 是內生且路徑相依下來考慮的。也就是說，內生且路徑相依的行動屬性，受到社會性事件的影響是相當清楚的。

(五) 考慮政治的過程與統治菁英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²⁰Pareto 以 Ricardian 等值定理為例說明。其認為如果沒能事先知道，他們在現在及未來，如何個別的修正經濟與社會均衡，那就不可能去比較借貸與課稅的效果。



Sensini²¹ 認為分析財政，需關切經濟與財務數量(著重經濟-財務均衡)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綜合性的財政即是 Sensini 所稱的財政社會學，財務事實與經濟的、政治的、財務的以及心理的因素之綜合，且行動的理論包含 Pareto 理論中邏輯的與非邏輯的行為，並且特別考慮到政治的過程，與統治菁英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在了解公共部門財政的組成方面，邏輯與非邏輯行動的混合是重要的。而社會均衡有五種財政效果：經濟效果、經濟繁榮效果、財務效果(預算)、政治效果、其他效果(心理) (Mclure, 2003)。

(六) 財政的本質上是政治的

Benvenuto Griziotti 對於使用經濟準則來處理財政覺得有問題，認為財政的本質上是政治的。公共支出負擔的配置，是不同納稅人階級間複雜戰爭的結果。因此，它並沒有對價值的問題提供一個解答，也不必然會受到經濟法則的影響 (Mclure, 2003)。

(七) 財政問題應由總體歷史的典範著手

J. Backhaus 認為「財政社會學是一種政策，其綜合經濟、財政、社會、法律等」，其可以用來研究在不同轄區之間的經濟管制(包括租稅)與整合，這些轄區之間有不同的歷史與文化，例如像歐盟(European Union)，在未來的進一步整合過程中，關於租稅的議題，如何讓各個會員國仍然保有部份主權，而又能調合與降低稅負的負擔(Backhaus, 2002)。在這一點上，Mick Moore 也認為關於財政問題，應由總體歷史的典範(macro-historical paradigm)著手，也就是考量社會、經濟及政治變遷的主要驅動力(Moore, 2004: 3)。

(八) 稅收的社會關係和稅收能力

John M. Hobson 提出稅收模式²²，稅收模式是由稅收的社會關係(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axation)和稅收能力(the forces of taxation)組成(Hobson, 1997: 189)。其中，稅收關係，指的是租稅負擔，在高所得或低所得者。而稅收能力指的是包含支撐稅收關係的各種稅收工具。而稅收關係，不是簡單的由國內範圍所產生的，

²¹Sensini 與 Borgatta 的重要性在於他們發展了一套分析架構，能容納財政學的經濟及社會面。

²²本段主要參考 Hobson (1997, 2000)。



生產之社會關係所決定。較合理的說，稅收關係是由一組複雜的國際、國內及從屬國家(政治的、財政的、階級的、經濟的)的要素所決定。而稅收能力包含國際的地緣財政壓力(international geofiscal pressures)、國內的國家力量(national state power)²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state-society variables)及國際間與國內的經濟及財政變數²⁴。

Hobson 以此架構，來說明在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國面臨國際的經濟大蕭條，與戰爭經費不斷提高的情況之下，英國以所得稅政策來籌措財源，並維持自由貿易的體制，然而德國與俄羅斯卻由間接稅來融通支出，並且採行關稅保護主義的體制，如圖 1 (Hobson, 2000：206)所示。

綜合上述各學者對於有機體社會的觀點，可歸納如下表 1。

²³ 國家力量包括(1)國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state-society)：國家廣泛鑲嵌在社會的程度。(2)專制力量 despotic power (3)滲透性力量 state penetrative power：滲入社會徵稅的能力(4)集中性 state concentration：國家在財政的集中程度。

²⁴ 這是屬於新韋伯歷史社會學派(neo-Weberian historical sociology)，其認為政府的經濟政策是部分獨立的力量互雜交錯的結果，而國家與國際經濟是由階級、地緣政治、財政及政治等力量變數所形塑，這些力量是由國境內及國境外所產生(Hobson, 1997：4)。黃崇憲(2005)，認為稅收模式中的稅收關係可以觀照到國家的階級性格，而稅收能力(國家財政收入的汲取能力)可以捕捉到國家能力最重要的向度，因此可以同時照應韋伯傳統與馬克思傳統的國家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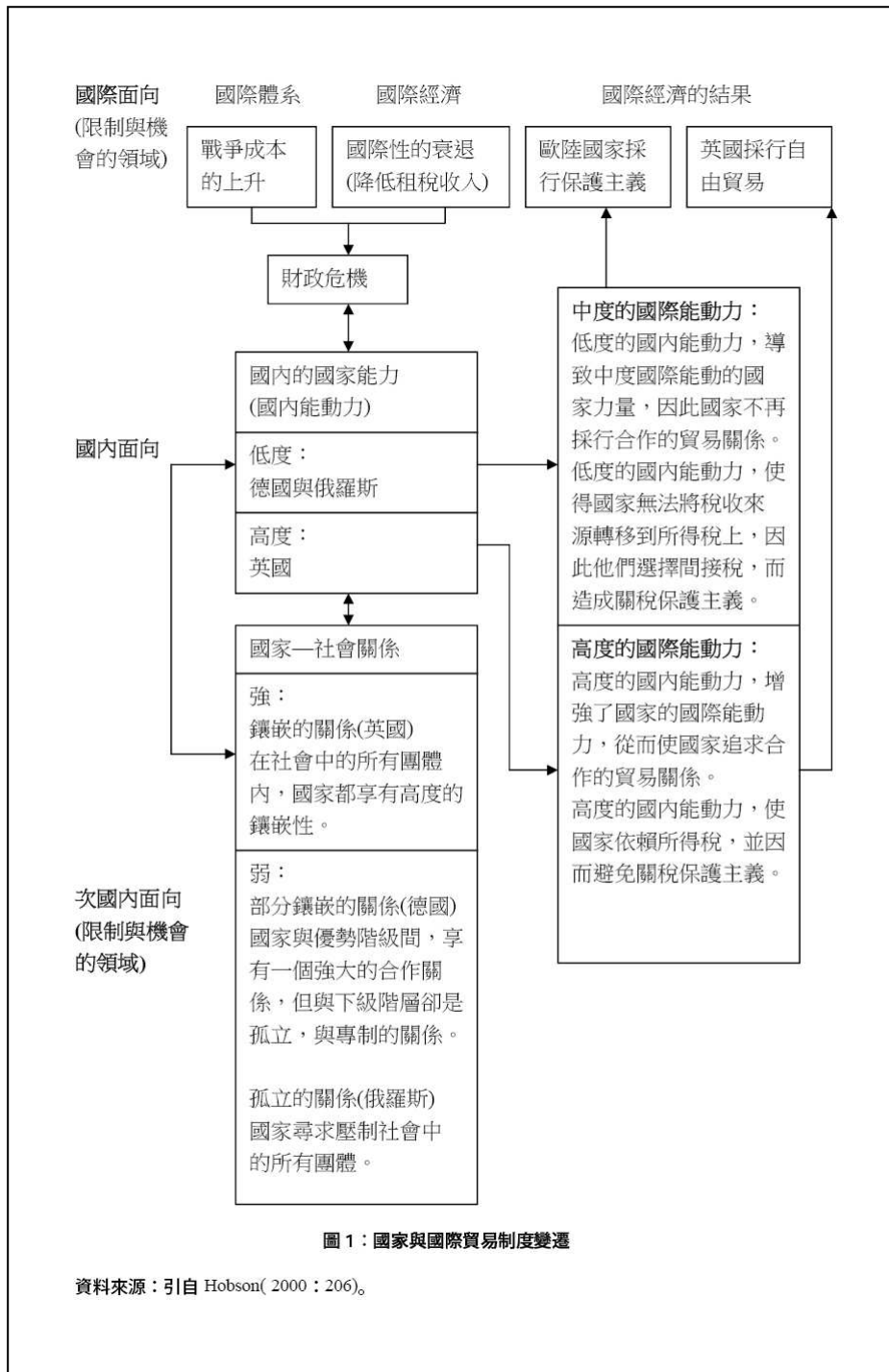


表 1：財政社會學對於有機體社會的觀點

財政社會學之學者	有機體社會的觀點
Goldscheid	將財政程序置於國家活動的中心，藉由探討多數家計單位的社會狀況與財政狀況，以及其加諸於社會的影響，來解釋財政赤字。
Schumpeter	在有些時期，財政政策的變化，幾乎可以用來解釋一個國家所發生之重大事件的全部；在大多數時期也可以用來說明，其所發生之重大事件的一大部分。
Pareto	經濟、社會變動，所導致經濟及社會均衡的改變，會影響稅收、支出及公債的組合。
Borgatta	實際的經濟因素決定社會與政治的結構，且藉由政治結構實現財政系統。
Sensini	而社會均衡有五種財政效果：經濟效果、經濟繁榮效果、財務效果(預算)、政治效果、其他效果(心理)。
Griziotti	財政的本質上是政治的。
Moore	關於財政問題應由總體歷史的典範著手，也就是考量社會、經濟及政治變遷的主要驅動力。
Hobson	稅收關係，是由一組複雜的國際、國內及從屬國家(政治的、財政的、階級的、經濟的)的要素所決定。而稅收能力包含國際的地緣財政壓力、國內的國家力量、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國際間與國內的經濟和財政變數。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二、 財政利益團體：階級(團體)分析

義大利與奧地利這兩個傳統基本上都是以階級(團體)分析，來探討整個國家經濟社會體系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並由此提出因應的方法。茲再細分六方面說明如下：

(一) 國家對勞動者的財政剝削與資本家在私經濟中對勞動者的剝削

Goldscheid 受到 Karl Marx 的影響，用階級分析來研究財政結果的剝削特性，他從財政史中發現，國家為了要回應公民逐漸要求權利的增加，而日益增加的處置公共財產，而且當國家越來越依賴公債時，便提供機會給公共債權人(他們的利益等同於資本家及統治階級)去剝削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下，租稅被壓迫來服務債務，表現為一種階級鬥爭，國家對勞動者的財政剝削，與資本家在私經濟中對勞動者的剝削，兩者相依且互相補充。因此，財政赤字的趨勢，變成是財政系統與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的一種結果。(Mclure, 2005)

他認為租稅國家，必須保持其所依賴的私經濟能健全的運行，以期能繼續獲得稅收，因而租稅課徵不得干涉儲蓄與投資(限制了利潤課稅及累進稅制的運用)，然而當戰爭或社會計劃，使國家需要的支出提高，而大於收入時，國家的借入款項增加，反受私人部門剝削。雖然人民得到國家的管理權，但他們繼承的只是一個債台高築，貧弱不堪的國家(Musgrave, 1980)。

(二) 租稅的負擔與公共需求的利益，隨著不同團體與不同階級而變化

Borgatta 擴展 Pareto 的「投機者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觀念，提供經濟發展的財政解釋。Borgatta 注意到歐洲經濟繁榮的快速成長，與藉由財政的經濟貨物重分配，兩者之間的關係。當財政政策課徵超過適當比例的租稅負擔，於低風險承擔的人(部分是因為他們較容易課徵，且較不可能去規避稅負)，資本將有效的移轉至高風險承擔的投資者，而這些較投機性的使用資本，在整體上來講，會導致經濟繁榮增加(Mclure, 2005)。

另外，其認為財政事件的均衡，是受到政治團體的影響，租稅的負擔與公共需求的利益，隨著不同團體與不同階級而變化。Borgatta 的財政社會學以下列三



者之間的關係來解釋財政事件：政治組織的活動(由少數及競爭的精英所控制)、經濟團體(由少數及競爭的精英所控)、社會的一般大眾(Mclure, 2006)。

(三) 財政決策與社會均衡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

Griziotti 檢視財政決策，與社會均衡(包括構成社會均衡之經濟、政治、行為的平衡)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

經濟均衡關切的是，市場力量分配資源與精英控制資源之間的均衡，穩定或不穩定。然而其亦會受到非市場因素(高風險的投機者，與低風險之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的影響，例如：財政政策會改變資本的私人擁有權(或控制權)，會導致改變投資決策的風險程度。

政治均衡最終所關切的是，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利之平衡。此均衡是受到政策上追求極大化社會福利，與政治菁英們藉由間接且狡猾的方法(或直接的方法)，去維持或獲取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而財政重分配，會改變資本的控制，可能是經濟與政治行動者之間互動的結果，例如同屬高風險的投機者與狐狸聯合，強調個人的權利，且將資本配置在風險性的活動。或者是，同屬低風險的 renitier 與獅子聯合，強調國家的權利，且將資本配置在低風險性的活動。

行為均衡是考慮在既定的集體社會規範下，遵守者體制者的情感(sentiment)，與不遵守體制者的情感之間的均衡。個人從他們行為所得到的滿足，大部分都決定於他們本身的個性與情感，因此個人天生個性與情感的傾向，會使其選擇作為社會體制的遵守者，或不遵守者。然而這亦會受到經濟，與政治菁英的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菁英能掌握遵守者，與不遵守者之個性及情感者，則能夠有效的行動，以影響大眾的行為，如圖 2 所示(Mclure, 20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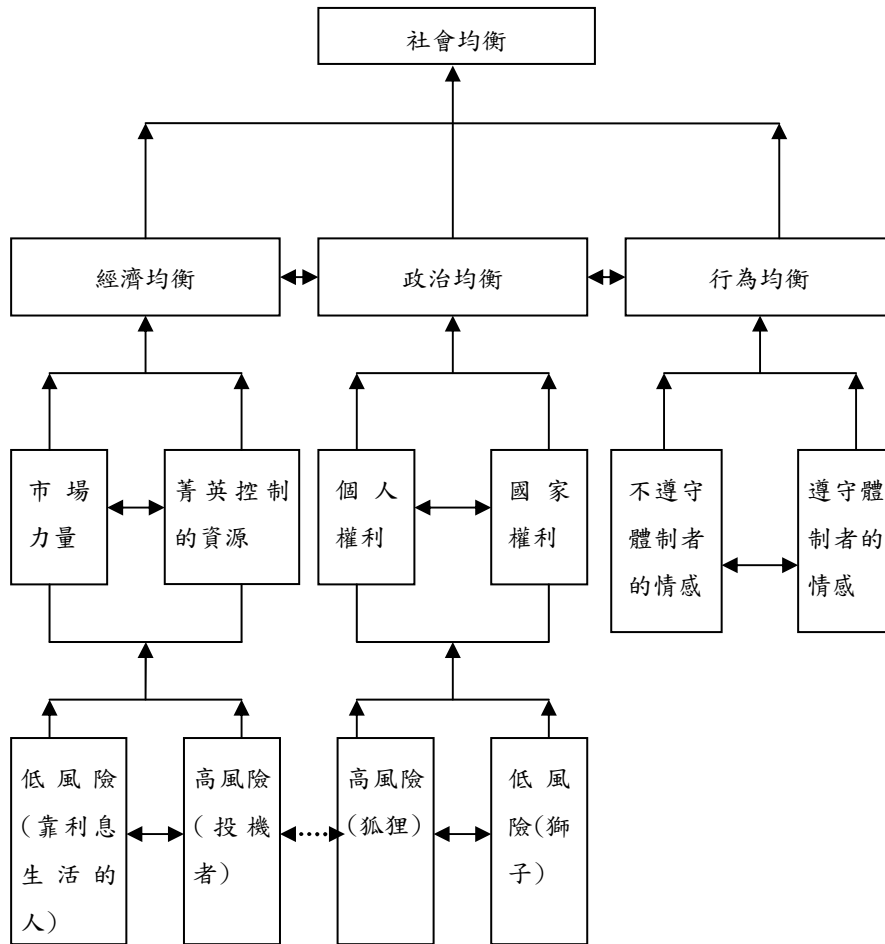


圖 2：社會均衡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引自 Mclure(2003：6)。

(四) 個人需求與集體需求之間複雜的關係發展

Schumpeter 以個人需求與集體需求之間，複雜的關係發展來分析租稅國家。其傾向於強調，在形成國家政策的活動中，團體及利益的角色，而且他對於集體需求的觀念，並非是很單純或簡單的，而是考慮存在於團體中，或團體之間社會力量的關係。



(五) 政府預算取決於社會中不同階級、團體之間社會與經濟衝突的結果

O'Connor 依馬克思階級鬥爭的傳統來發展，其認為構成政府預算的公共支出，與稅收的分配，事實上取決於社會中不同階級、團體之間，社會、經濟衝突的結果(O'Connor, 1973: 2)。而財政赤字的發生，乃因支出需求增加，而國家取得收入的能量有限，所產生結構性差距所致。差距兩端，各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和國家必須扮演的角色所造成。依 O'Connor 的看法國家必須履行兩項互相衝突的功能。第一，使用支出政策，保持獨占性資本部門有利可圖的累積。第二，在不傷害到這些部門的限制下，取得必要的收入以融通這些支出。然這兩個目標不能並存，結構性的差距隨之而起，產生財政赤字。基於第一項功能，國家必須提供社會投資與社會消費。社會投資，像道路、教育等，是維持利潤累積所必須。以馬克思學派的觀點來說，這些投資經由固定資本存量增加，促進勞動生產力。而社會消費，像社會保險和公共衛生等支出，增加了變動資本存量，因此減少雇主使用勞力再生產的成本。這兩種型態的社會資本，皆有利於增加剩餘價值及利潤。同樣是基於第一項功能，國家必須從事社會福利支出。這些支出並不能增加生產力，但為確保社會和諧，以使獨占性資本達成其任務，乃使資本主義制度，被認為合理所必須的(O'Connor, 1973; Loxley, 1982)。

這些支出的重要，占國民生產毛額比例增加了。而社會資本形成，也隨著獨占資本部門的要求而增。因此公家提供的投資財所包含的範圍，也就愈來愈廣。國家的擴張，不是取代獨占性資本，而是增益其利潤及為其生存所必須。由於成為無產階級的人口比例不斷增加（進入勞動工資地位）。因此，人際關係之間更形疏遠，所以為維護其基本人權及引起的安撫費用需求，亦同樣增加。各項私人利益，由於各種自私自利而經常相互矛盾的計劃衝突，以及為解決這類問題，在行政上無條理和無效率的預算程序，致使國家支出加速成長。

雖然支出增加，而收入基礎並未擴大。社會資本的支出，不論固定的或變動的，都具有生產性，但是利益卻歸屬獨占性資本。經由利潤稅或累進的所得稅，所能收回的確有限，因為大企業及工聯，不會容許充分的利潤稅或所得稅以支應增加的費用。因而國家被迫做膨脹性的融資。O'Connor 深信國家和獨占性資本（一個工業的與社會的複合體）能夠結合起來，以渡此難關，但問題在於需要社會和政治從事主要而又不可能達成的改變，以容許此一聯盟的存在。因此從實際的一面來看，即是財政危機與崩潰。也就是說政府費用的數額和構成項目，以及稅



源的分配，並不是由市場的規律所決定；在結構上它是由階級之間、群體之間的社會衝突和經濟衝突決定的，當然，也反映了那些衝突(Musgrave, 1980)。

(六) 財政利益及成本與團體較有關連而非階級

Musgrave 其依 Schumpeter 分析的模式而發展，在預算中，由於結構的不平衡，才導致財政危機的趨勢。Musgrave 強調財政利益及成本與團體較有關連，而非階級，例如租稅活動受到所得來源、嗜好、家計支出的型態和年紀的影響，而且其認為 Goldscheid 與 Schumpeter 都低估了租稅國家的恢復力，與持續擴張租稅的能力(Musgrave, 1992)。

綜合上述各學者對於階級(團體)分析的觀點，可歸納如下表 2。

表 2：財政社會學對於階級(團體)分析的觀點

財政社會學之學者	階級(團體)分析的觀點
Goldscheid	國家對勞動者的財政剝削，與資本家在私經濟中對勞動者的剝削，兩者相依且互相補充。
Schumpeter	以個人需求與集體需求之間複雜性關係的發展，來分析租稅國家。他認為租稅導致國家的形成，其傾向於強調在形成國家的政策活動中，團體及利益的角色。
Pareto	考量「投機者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之間的關係。
Borgatta	以「投機者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的觀念，來說明租稅政策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並以政治組織、經濟團體及社會的一般大眾，三者之間的關係來解釋財政事件。
O'Connor	構成政府預算的公共支出，與稅收的分配事實上取決於社會中不同階級、團體之間社會、經濟衝突的結果。
Griziotti	在經濟均衡上，用「投機者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的觀念，來說明財政政策如何改變投資決策的風險程度。在政治均衡上，則用「狐狸(強調個人的權利)與獅子(強調國家的權利)」，搭配「投機者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說明財政重分配如何改變資本的配置。在行為均衡上，考慮在既定的集體社會規範下，遵守體制者的情感，與不遵守體制者的情感之間的均衡。
Musgrave	強調財政利益及成本與團體較有關連而非階級，例如租稅活動受到所得來源、嗜好、家計支出的型態和年紀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肆、財政社會學所提出財政赤字的成因與因應策略

財政社會學的學者在辯證唯物主義，以及引申二元論的基礎下，利用整體主義，以及階級(團體)分析，依照其所處的社會結構，提出不同的財政赤字成因，與因應策略。

一、 財政赤字的成因

關於財政社會學對於財政赤字的成因，則依不同學者所處的社會結構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看法，茲以下列三點，分別敘述如下。

(一) 財政赤字的趨勢變成是財政系統與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的一種結果

Goldscheid 以階級分析來研究財政結果的剝削特性。結果，他從財政史中發現，國家為了要回應公民逐漸要求權利的增加，而日益增加的處置公共財產，而且當國家越來越依賴公債時，便提供機會給公共債權人(他們的利益等同於資本家及統治階級)去剝削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下，租稅被壓迫來服務債務，表現為一種階級鬥爭，國家對勞動者的財政剝削，與資本家在私經濟中對勞動者的剝削，兩者相依且互相補充。因此，財政赤字的趨勢變成是財政系統，與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的一種結果(McClure, 2005)。

(二) 國家必須履行兩項互相衝突的功能

依 O'Connor 的看法，國家必須履行兩項互相衝突的功能。第一，使用支出政策，保持獨占性資本部門有利可圖的累積。第二，在不傷害到這些部門的限制下，取得必要的收入，以融通這些支出。然這兩個目標不能並存，結構性的差距隨之而起，產生財政赤字。

(三) 資本主義之經濟資源私有化制度

黃世鑫(1998)認為：財政赤字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之經濟資源私有化制度，由於在經濟資源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不僅處於經濟上的弱勢，亦處於



政治上的弱勢。因此，在國家預算的決策過程中，是一種個人剝削個人，個人剝削國家，私人剝削社會的場所，國家財政赤字也因此而產生。

而且根據財政社會學的觀點，財政赤字是一種症狀，其只是顯現因生產技術進步，改變生產關係，對社會結構的變遷產生衝擊，且因著社會結構變遷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衝突，而衍生的社會問題。

二、 財政赤字的因應策略

關於財政社會學因應財政赤字背後，所顯現的整個國家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策略上，則依不同學者所處的社會結構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看法，茲以下列三點，分別敘述如下。

(一) 勞動階級藉由創造一個國家資本主義，來征服貴族階級

Goldscheid 對於財政赤字，與財政剝削的解決方案是，勞動階級藉由創造一個國家資本主義，來征服貴族階級，國家取得財產用在經濟的目的，相關的剩餘價值，則用在社會的利益。

他認為為解決此債台高築的國家，就須把財產還給國家，再經由對資本課稅，使之足以創造一個公營企業，來生產社會所需的財貨與勞務。根據他的了解，資本家矛盾的根本原因，乃在於財產從國家中分離出來。而非馬克思所言，財產從工資勞動中分離出來。只要國家重獲財產，一個混合的經濟社會存在，社會進步將可隨之展開(Musgrave, 1980)。

(二) 公私部門分開，國家才能存在

Schumpeter 認為：財政體系的發展，是了解社會變遷的重要原因，並斷言只有公私部門分開，國家才能存在。他指出國家依賴私人部門的重要性，在私人部門的生產，比較關心私利的情形下，租稅的課徵，必將干擾經濟誘因，當收入需求過量時，租稅國家將崩潰(Musgrave, 1980)。

對 Schumpeter 而言，財政危機還未證明，他的興趣並不在週期性，或可避免的危機，而在於國家基於回應公共，與私人需求而提供勞務，是否會使得租稅國家傾向租稅危機。Schumpeter 認為租稅國家有可能崩潰，但財政崩潰，並非租稅



國家邏輯上的必然(Mclure, 2005)。

(三) 藉由國家和獨占性資本的結合，來對付財政困境

O'Connor 對於財政困境，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主張降低沒有生產性的社會費用，並以社會主義，取代先進資本主義，藉由國家和獨占性資本(一個工業的與社會的複合體)的結合，來對付財政困境的難關。

伍、財政社會學對於我國財政赤字問題的意涵

綜合上述對於財政社會學的探討，包括：財政社會學的方法論基礎、財政社會學對於財政問題的研究方法、財政社會學所提出財政赤字的成因與因應策略。其對我國財政赤字問題的意涵包含下列三方面，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對財政赤字問題的觀點

(一) 財政赤字只是一種症狀

如同 O'Connor 所言，政府費用的數額和構成項目，以及稅源的分配，並不是由市場的規律所決定。在結構上它是由階級之間，以及群體之間的社會衝突和經濟衝突決定的，當然，也反映了那些衝突。

經濟利益的衝突，不論是社會問題、生產問題、環保問題等，都會反映在財政赤字當中。所以，隱藏在財政赤字後面的乃是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因此，面對財政赤字的問題必須從其根源，也就是從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來著手。

(二) 政府與市場乃是有機性的融合

根據財政社會所採用的辯證唯物主義、引申二元論與多元論的觀點而言，政府與市場都是整個社會經濟系統中，要素與產出的一種分配機制或制度，兩者互相形構，並具有相同的社會基礎，鑲嵌於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彼此之間乃是一種有機體的融合。



市場與政府對於要素與產出的分配，始終鑲嵌於社會制度。並非是一個獨立的領域，而是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中所進行的一種社會活動。

(三) 整體社會因素對於財政赤字問題的重要性

財政社會學所強調的是國家預算之社會的本質，國家預算係鑲嵌或根植於社會之中，透過財政社會學才能掌握國家預算結構的「社會的因與果」(黃世鑫，2003：98)。

如同 Pareto 所言，其認為對於財政現象的理論，所需要處理的不僅僅是經濟面與政治面。因為財政事件的經濟與政治層面，會與廣泛的社會限制有所互動，這種互動會改變個人對於效用的評估。因此財政活動最好由其與社會因素的關係來評價。也就是說，生產技術改變所引起的經濟利益衝突，並由此而衍生的財政赤字問題，要視整個社會之政治系統、社會結構、道德價值及文化傳統而定。

(四) 財政赤字問題是一個分配問題

財政社會學認為財政赤字的問題根源在於，資本主義之經濟資源私有化制度(黃世鑫，1998：434)。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導致國民彼此之間「經濟力」的不均等，而經濟力的不均等，在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會延伸到政治與社會層面，使得「政治力」與「社會力」亦不均等。因而，在爭奪預算大餅的過程中，自然產生剝削的行為，亦即在資源分配的經濟利益衝突中，擁有較多經濟力的優勢階級(團體)，會剝削經濟力較差的弱勢階級(團體)。故財政赤字問題的癥結在於，一套公平的分配私有財產權與公平的自由競爭的規範制度。

而市場的功能是在於，在既定的相對自然價格下，依個人的實際經濟能力決定為誰生產(商品市場是分配所生產出來的財貨)，同時決定生產什麼(要素市場是分配生產要素的去向)。也就是說，市場是分配資源的場所。因此市場要有效率，需要經濟資源有公平合理的分配為前提，亦即效率是建基於公平的基礎之上，市場結構健全與否，主要是基於分配公平的考量。因為，自由的交易，乃建立在公平的議價能力之分配，而自由的競爭乃建立在機會均等的公平基礎上。所以，私有化經濟資源的分配能公平，才有自由交易和自由競爭。也就是說，效率是建立在公平合理的財富分配上，沒有公平的分配也就沒有效率(黃世鑫 1998：157—161)。

這樣的觀點與福利經濟學所謂分配與效率可以分開考量，是不同的。根據福



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任何一個競爭性的均衡皆具有 Pareto 效率」，其說明競爭性的市場，將會使得所有的交易利益都得以實現，而這樣由競爭性市場所達成的經濟資源配置，具有 Pareto 效率。另外，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當所有市場參與者具有凸性偏好的時候，則在適當的稟賦分配下，總是存在著一組價格，使得 Pareto 效率配置點是一個市場均衡」，其說明了分配與效率兩個問題是可以分開的，不管你想要哪一個 Pareto 效率配置，都可以藉由市場機制來達成。

然而，針對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而言，其隱含假設所有的產品，與要素市場都是完全競爭市場，市場參與者之間，彼此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人可以控制市場²⁵，這其實說明了所有參與者皆為價格接受者，且具有相同的議價能力(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所以才沒有人可以控制市場；另外，其所假設的同質性經濟人，具有相同的稟賦與購買力，彼此之間沒有差異，這樣的假設，其實已經將經濟資源分配的問題，預先設定是一個合理的經濟資源分配。所以我們才說，其本身亦隱含效率是建立在公平合理的財富分配上，沒有公平的分配也就沒有效率。

(五) 政策工具須重視國民之間的成本、利益歸宿分配

政府的政策工具，不管是行政干預(包括管制、補貼、課稅)還是直接生產(價格上可能是免費、成本定價、獨占價格)，不同的政策工具對於政府的歲出、歲入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且在國民之間的成本與利益歸屬的分配亦有所不同。若依財政社會學的觀點，對於政策工具優劣的評估，不能僅著重在歲收與歲入的層次，須重視成本、利益對於社會各所得階層間之歸宿分配(黃世鑫，2003：177)。

重視政策的分配效果，才能夠確實反映社會各利益團體的情況，達到政策工具的目的、若僅著重在預算效果，將導致某些利益團體的情況未能被考慮進去，這樣並無法反應政策工具的目的。

(六) 財政利益團體的多面性

除了以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來解釋國家財政赤字之外，生產要素與專業階層，亦可作為財政利益團體的區分標準。說明如下：

1. 生產要素作為財政利益團體的區分標準

²⁵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還隱含假設沒有消費外部性、存在競爭性均衡。



黃世鑫(2003: 110)，提出生產要素之間的競爭，三大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這三項生產要素在生產活動之中，同時存在相輔相成與互相替代的關係。就資本這項生產要素而言，其向來有較大的決定權，亦漸漸侵入土地與勞動的範疇，使土地與勞動資本化。

另外，資本亦分化為工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彼此之間亦存在著相互依存與彼此剝削。而由於生產組織的改變，使得資本的所有人，與資本的運用人分離，再加上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透過資本的證券化，轉化為金融資本，使得資本的運用人得以支配資本的所有人。

2. 專業階層作為財政利益團體的區分標準

Harold Perkin(1996)認為，後工業社會中對於社會資源的競爭，不是在以生產要素為主的階級之間，而是在專業人員所形成的專業階層之間的鬥爭。如同Daniel Bell所提到的，大部分的社會分析，將研究焦點集中在階級上，關注在社會中有隸屬關係的橫切面單位上。然而對後工業社會而言，分析的焦點可能是其工作地點，一組垂直的等級關係，將會是政治著力的最重要地點。在可能的工作地點上：有四個職能的工作地點，科學的、技術的(工程、經濟、醫學)、管理的、文化的。有五個組織的地點：經濟企業、政府官署、大學和研究團體、社會團體、軍事單位。因而未來的主要利益衝突，將會發生在工作點團體之間(Bell, 1973)。

由上述的論點可知，由於在後工業社會中，是由掌握人力資本(腦力、智力、專業技術知識)之稀少性資源擁有者所控制。因此以專業階層作為財政利益團體的分類標準，可適用於後工業社會的實際狀況。

二、財政赤字問題的分析架構

根據財政社會學的觀點，財政赤字是一種症狀，其只是顯現因生產技術進步，改變生產關係，對社會結構的變遷產生衝擊，且因著社會結構變遷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衝突，而衍生的社會問題。

除此之外，財政赤字所呈現的收支餘絀，只是眾多法規條文的數字呈現，而眾多法規條文是代表政府功能的發揮。更重要的是，政府功能又係決定於一定的經濟基礎所形塑的社會結構，如圖3►虛線箭頭所示(財政赤字.....►歲入、



歲出▶法令規章▶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因此財政赤字的問題，決不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所建議的「開源、節流」就可以達成目標。

而如欲探究財政赤字背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須先了解社會結構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轉變的影響，及其進而對法規條文及歲入、歲出的影響，如同圖3——▶實線箭頭所示，經濟基礎——▶社會結構——▶法令規章——▶歲入、歲出——▶財政赤字。同時也非僅僅是財政赤字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已，如圖4▶虛線箭頭所示(黃世鑫，2003：100)。

就經濟基礎至社會結構的步驟而言，馬克思認為生產模式所決定的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經濟的結構。這也是奧地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探討財政赤字問題的基礎。義大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亦接受技術進步對於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

而就社會結構至法令規章的步驟而言，義大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在引伸二元論與多元論的基礎下，強調不同團體(階級)對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力，都會透過法令規章的制定，而影響政府功能的發揮。奧地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則以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或生產要素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法令規章的制定過程，以及由法令規章所代表的政府功能。

另外，就法令規章至歲入、歲出的步驟而言，奧地利傳統的 O'Connor 認為在現行的法令規章之下，國家所須履行的功能是互相衝突的，這使得歲入與歲出產生結構性的差距。義大利傳統的 Borgatta 則認為財政系統是由法規規章所蘊含的政治結構來實現的。

最後，就歲入、歲出至財政赤字的步驟而言，義大利傳統與奧地利傳統的財政社會學，皆認為財政赤字只是收支餘絀的呈現，歲入、歲出的差距並非是財政赤字成因的根本。

因此，財政赤字背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之真正關鍵在於，經濟基礎所形塑的社會結構，探討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才是了解財政赤字形成的根本，而對於社會內部組成結構有系統的加以分析，才能掌握財政赤字的癥結。

也就是說，財政赤字背後的社會問題，乃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所形塑之社會結構下的社會力發揮，透過政治與經濟體制所產生的結果，在以貨幣交易活動為



主的後工業社會下，不能量化的社會關係呈現於政府預算之中(黃世鑫，1994)。

這樣的分析架構，也正如同 Schumpeter 所言，財政社會學是一門研究國家財政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各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國家之性質的學問。蘊藏在預算數字背後的財政事務與社會結構之關係，以及其間所引起之相互變動的史實必須加以研討，必能對世事之演變有所體認(Schumpeter, 1954)。

三、以專業階層為財政利益團體之區分標準，來探討我國的財政赤字問題

如同表 2：「財政社會學對於階級(團體)分析的觀點」之說明，財政社會學對於財政利益團體的問題上，Goldschied 認為是國家、資本家與勞動者，Schumpeter 認為是個人與集體，Pareto 認為是投機者與靠租金、利息、股息生活的人，Musgrave 則認為財政利益團體受到所得來源、嗜好、家計支出的型態和年紀的影響。

然而在考慮我國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下²⁶，並不適合引用這些觀點來解釋。如同 Perkin 所言，後工業社會中對於社會資源的競爭，並不是在以生產要素為主的階級之間，而是在以專業人員所形成的專業階層之間，以及專業階層與非專業階層之間。因此，以專業階層作為財政利益團體的分類標準，可以適用於分析我國財政赤字問題的實際狀況。

所以，對於圖 3：「財政赤字分析架構圖」中的社會結構，其所強調的是，在後工業社會中，社會結構因為生產技術變動而產生的變化中，最重要的乃是「整體社會由專業菁英所組織與控制」，而其中對於財政資源的競爭，乃是強調專業階層之間，以及專業階層與非專業階層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而有別於以往關於我國財政赤字的文獻中，所強調的生產要素之間，或者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對於財政資源的競爭。

²⁶ Bell(1973)以及 Block(1990)皆以第三級產業的就業人數與產值，來作為判斷後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徵。因此，我們可以用服務業就業人數超過工業就業人數的民國七十七年，做為台灣邁入後工業社會的時間點，若以服務業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做為標準，則是民國七十八年。林萬億(2008)、李碧涵(1994)亦認為台灣在民國七十七、七十八年以後已經逐漸邁入後工業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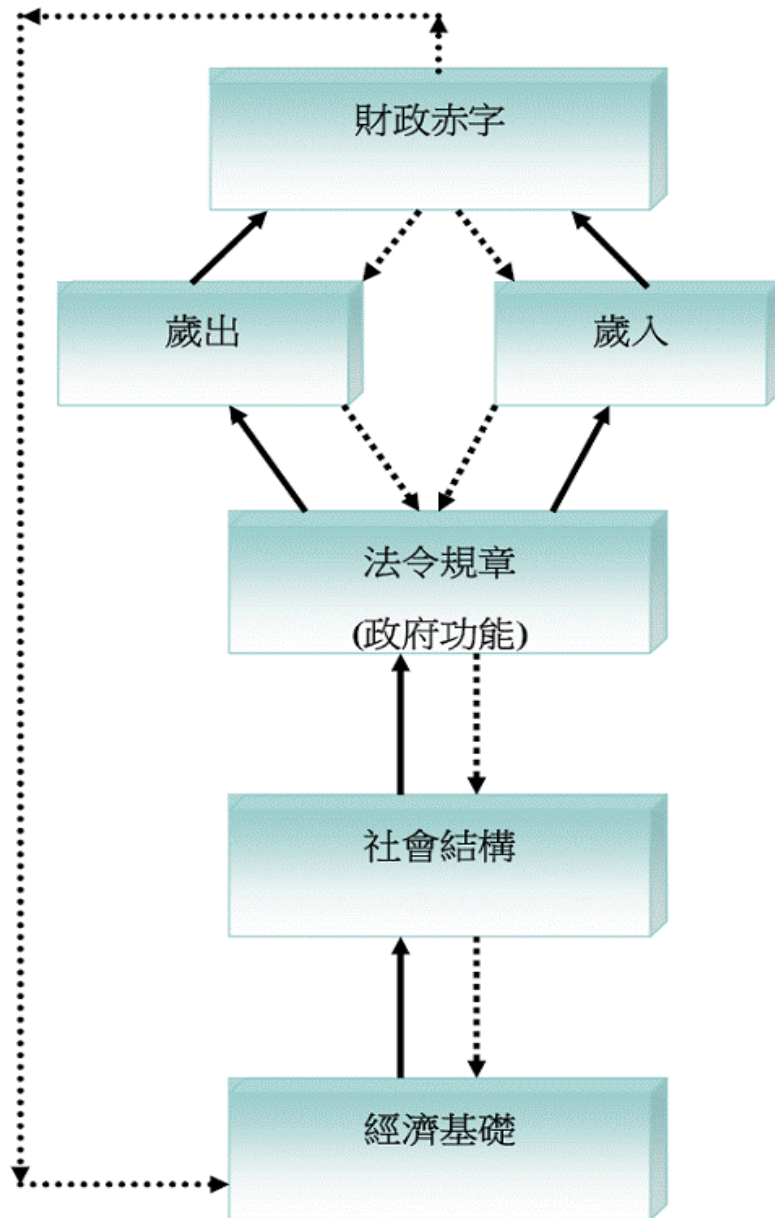


圖 3：財政赤字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引自黃世鑫(2003：100)。



陸、結論

現行政府關於財政赤字的因應策略，包括：開源節流、理性預算制度、限制公債之舉借與債務上限。由於這些策略侷限在政府預算的層面，而未能與更為廣泛的經濟問題，和社會政治體系的問題聯繫起來，沒有辦法與社會上眾多群體的互動聯繫起來，也就是沒能將財政社會學所強調的：「整體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的社會，而財政只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納入策略的理論基礎。亦即未能清楚認知：(一)財政赤字只是一種症狀；(二)政府與市場乃是有機性的融合；(三)整體社會因素對於財政問題的重要性；(四)財政赤字問題是一個分配問題；(五)政策工具須重視國民之間的成本、利益歸宿分配等觀念。以致於雖然政府有各式各樣的努力，然而台灣政府的財政赤字卻看不出有任何減輕的跡象，仍然無法有效的掌控且不斷的擴張。

財政赤字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經濟基礎所形塑的社會結構，探討社會生活基本型態的轉變，與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才是了解財政赤字形成的根本，在目前台灣的社會結構上有以下的趨勢：(一)每人國民所得的提升；(二)第三級產業的興起，第一、二級產業相對於第三級產業的比重相對下降；(三)專業階層(professional hierarchy)取代階級(class)成為社會結構主要的基礎；(四)專業階層藉菁英領導制度(meritocracy)來增加成員；(五)婦女的就業率提升；(六)政府支出的成長；(七)公民權觀念的擴大；(八)高等教育的擴充；(九)大型公司的興起；(十)全球化經濟的影響。這些趨勢說明了台灣正處於所謂的後工業社會(Perkin, 1996、李碧涵, 1994、林萬億, 2008)。因此，唯有對於後工業社會下，台灣之社會內部組成結構有系統的加以分析²⁷，才能掌握財政赤字的癥結。亦即，探討社會結構變遷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衝突，及其對於政府法令規章與財政上歲入、歲出的影響，則可以作為紓解我國財政困境之策略的理論基礎。

²⁷ 這部份將另有專文加以剖析。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李碧涵，1994，〈台灣地區後工業轉型之國家與社會〉，《中山學術論叢》，第 12 期：頁 245-282。
- 林萬億，1991，〈社會工作擴散與本土化—概念與論題〉，《社會工作學刊》，創刊號：頁 15-31。
- 林萬億，2008，〈台灣的人口變遷與因應對策〉，「2008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新世紀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議與創新：跨時變遷與跨國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台灣社會福利學會(2008.05.23-24)。
- 馬元德、張金言譯，1992，《馬克思主義的主流(一)》，Leszek Kolakowski 原著，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黃世鑫，1994，〈福利國家 VS. /& 財政赤字？被「閹割」的現代財政理論〉，「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研討會」，台北：中國經濟學會(83.5.7)。
- 黃世鑫，1998，《財政學概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 黃世鑫，2003，《2010 年社會發展策略(財政與經濟組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研考會。
- 黃崇憲，2005，〈從鑲嵌自主性到正當性危機：台灣發展型國家轉型的財政社會學分析〉，「國家與現代性 (I)：現代性與台灣政治/經濟轉型學術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2005.07.16)。
- 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2005，《科學革命的結構》，T. S. Kuhn 原著，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版。
- 楊世雄，2001，《馬克思的經濟哲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鄭劍豪，2002，《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冀劍制，2006，〈心物二元論的惡果〉，《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5期：頁169-185。

英文部份

Backhaus, J., 2002, “Fiscal Sociology : What for?”.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 61(1) : 55-78.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y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 Basic.

Bell, Daniel, 1974, “The Public Household – On Fiscal Sociology and Liberal Society”. *The Public Interest*, 35 : 29-68.

Bell, Daniel,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Basic.

Dow, Sheila C., 1990, “Beyond Dualis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 143-157.

Goldscheid, Rudolf, 1967, “ A Sociology Approach to Problem of Public Finance” . in Musgrave, R.A. and T. Peacock(eds),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202-213. London : Macmillan.

Hobson, John M., 1997, *The Wealth of States :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John M., 2000,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xley, John, 1982, “Fiscal Sociology and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Contemporary Crises* , 6 : 285-301.

McLure, Michael, 2003, “An Italian Foundation For New Fiscal Sociology : A Reflection on the Pareto—Griziotti and Pareto—Sensini Letters on Ricardian Equivalence and Fiscal Theory”.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 No.03.11.



- McLure, Michael, 2004, "Pure Duals , Derived Duals And Paretian Fiscal Sociology" ,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04.25.
- McLure, Michael, 2005, "Approaches to Fiscal Sociology" , in : Jurgen G. Backhaus(eds) , *Essays on Fiscal Sociology*, 38-50. Frankfurt : Peter Lang.
- McLure, Michael, 2006, "The Fiscal Sociology of Gino Borgatta: Pareto, Extra-Economic 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0(4) : 521-539.
- Mearman, Andrew, 2005, "Sheila Dow's Concept of Dualism : Clarification Criticism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9 : 619-634.
- Moore, Mick, 2004, " Revenues , State Formation ,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Countries"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5(3) : 297-319.
- Musgrave, Richard A., 1980, "Theories of Fiscal Crises :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 in Aaron, Henry J. , Michael J. Boskin(eds), *The Economics of Taxation*, 316-390. Washington : Brookings Institution.
- Musgrave, Richard A., 1992, "Schumpeter's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2(2) : 23-47.
-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St. Martin's Press.
- Perkin, Harold, 1996, *The Third Revolution :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 in Alan T. Peacock (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apers* , no.4, 5-38. MacMillan.



Reviewing National Fiscal Deficit of Fiscal Sociology

Chia-Jen Ch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figures of debts which as far as either balance per year or accumulated unpaid debts are concerned, the fiscal conditions of governments in every level are in the trend of seriously worsening. And currently the actions government takes to face the fiscal deficit include increasing revenue and decreasing expenditure, privatization, loosening enactment, limiting government bonds issuing and debts upper limits, macro budgeting, entrepreneurial budgeting, etc. However, although with all the efforts, fiscal deficits don't seem to slow down. It still can't be well controlled and keeps expanding.

For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Fiscal Sociology which emphasizes the whole society is a organic society, and finance is just part of it; and further treats the views of Fiscal Sociology to fiscal deficit. From this investigation, we can understand why our fiscal deficit can't be well controlled and keeps expanding; in the other way it can be the theory base for government's strategy to face the fiscal deficit.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views of fiscal sociology to fiscal deficit, when we face Taiwan's fiscal deficit in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we may understand the forming basis of fiscal deficit by investigating the changing of the basic lifestyle of Taiwan society and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herefor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aiwan society's internal forming structure at this post industrial era can manage the crux of fiscal deficit.

Key Words : Fiscal deficit 、Fiscal Sociology 、Derived dualism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